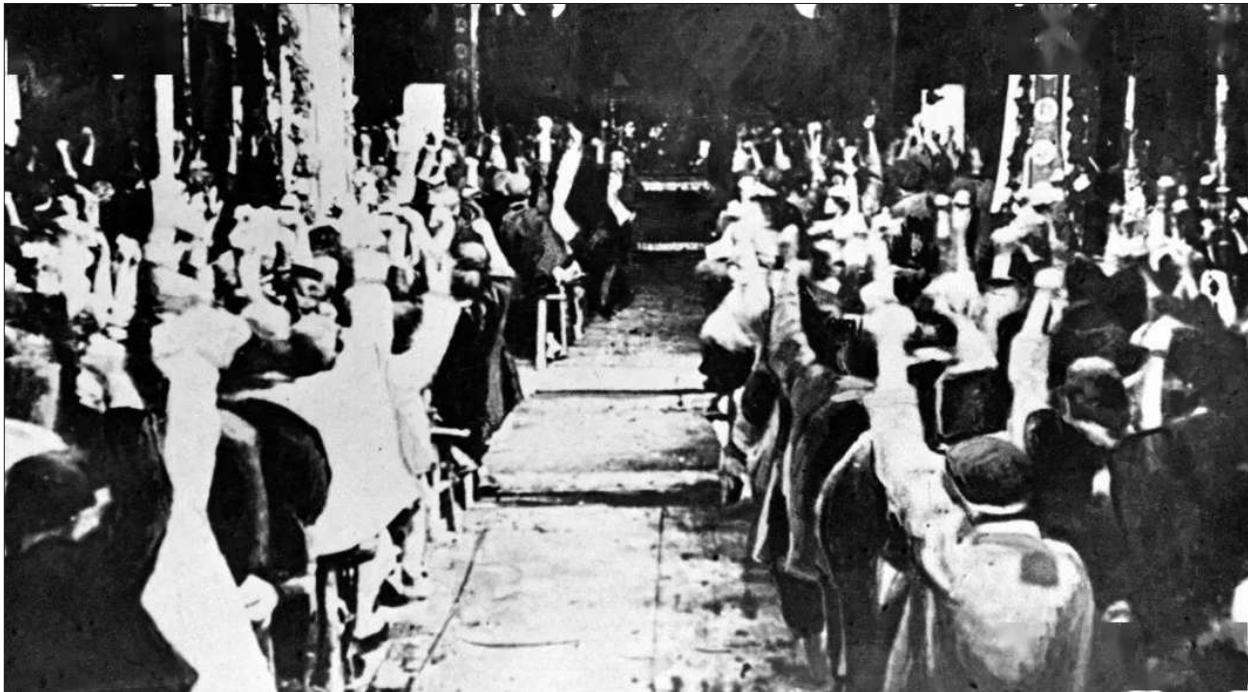


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女性风采

徐佳佳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叶坪村召开，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办过程中，众多苏区妇女参与其中，为大会的顺利召开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由于在妇女工作、文化教育、医疗卫生、扩红运动等方面的出色成绩，一些苏区妇女还被选为各级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通过参加各级苏维埃代表大会，她们参政议政，发表和提出了大量关于苏区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中肯看法和建议。在各级苏维埃代表大会结束后，她们继续履职尽责，密切联系群众，在工作中发挥代表的模范作用，成为苏区政治生活中的一道亮丽风景。

筹办“全苏大会”

在苏区召开的各级苏维埃代表大会中，以1931年11月和1934年1月召开的两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规模最大、影响最广。在这两次“全苏大会”的筹办过程中，大量苏区妇女承担了前期选举、会务及会议中的演出任务等。

1931年10月15日，中共临时中央致电苏区中央局，要求“党现在必须动员一切力量，准备全苏大会的开幕”“大会开幕时，必须举行全苏区的庆祝大会与群众游行，赤少队、少年先锋队、童子团等必须全体参加，在可能条件之下，举行一部分红军阅兵式，各地党团以及工会等群众组织，必须选派大批代表，列席旁听与庆贺”，要求会务工作“细致、高效完成”。为此，康克清、贺子珍、彭儒、张亮等积极踊跃地承担了这项艰巨的工作。其中，张亮刚刚来到中央苏区且康复不久，但了解到“一苏大会”的会务工作十分繁重，就对筹备工作的负责同志表示：“搞后勤事务我熟悉，你放心吧。”之后，这些女同志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妥善周全地解决了“一苏大会”代表的住宿、会场布置、各类会议材料的装订和分发以及会议的伙食采买等会务问题。

除了会务工作，“一苏大会”筹备委员会还希望会议期间能够为代表们提供一些文艺活动。刚来到瑞金不久的危拱之、李伯钊等临危受命，圆满地完成了这项工作。

危拱之和李伯钊来到中央苏区前，都在苏联学习过，政治理论功底较为扎实。尤其李伯钊还在莫斯科与沙可夫等一起排练演出过戏剧。因此，在接到中共中央关于“一苏大会”期间组织文娱活动的任务后，李伯钊等就立即着手准备。李伯钊等不仅为大组组织了提灯游行、社火、扇舞等群众文艺活动，还将苏联著名的戏剧《农奴》结合苏区土地革命进行改编，并邀请何叔

衡、李克农等苏区干部参演，受到“一苏大会”代表的喜爱。

除了留苏女干部，一些基层妇女群众也主动参加了“一苏大会”的文艺演出。其中，出生在瑞金沙溪村的刘翠莲就带领当地妇女为“一苏大会”代表和群众表演了茶灯舞，演唱了红色歌谣。

推选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

在召开各级苏维埃代表大会前，各级苏维埃选举委员会都会组织选举活动选出群众满意的代表。其中，“一苏大会”选出正式代表610名，“二苏大会”选出正式代表693人，候补代表83人，旁听1500多人。同时，在省、县、区、乡（市）苏维埃代表大会中，也选出了大量苏维埃代表，其中，女性所占比重不断增加。

这一情况的形成，首先与各级苏维埃政府、党委大力推进妇女解放有关。1930年7月20日，闽西苏区就发布了《关于第二次代表大会及对选举法的修改问题》，要求“工农代表全数中，青年至少要有百分之三十以上，妇女要占百分之二十”。而1933年9月中共中央组织局在《动员劳动妇女参加选举》中也强调“各级党部必须立即进行组织广泛妇女参加选举运动，经过女工农妇代表会，来切实动员，必须达到妇女代表占百分之二十五的任务”。

苏维埃代表中女性所占比重不断增加，还与广大苏区妇女在工作中的突出表现有关，这里仅举一例。1903年出生在福建省永定县的范乐春很早就参加了革命，并在溪南区苏维埃政府中担任了妇女主任一职。在工作中，她经常引导当地妇女积极学习党和苏维埃政府的政策，鼓励她们入党、入团，成为扩红运动的积极拥护者，为扩红运动的顺利开展而努力。因此，范乐春不仅多次被选为永定县、闽西苏维埃工农兵代表大会的代表，还在1931年10月被选为“一苏大会”的正式代表。

“一苏大会”召开后，更多妇女投入到苏区各项建设中。因此，“二苏大会”召开时，代表中的妇女更多。1934年1月1日梁柏台在《今年选举

的初步总结》中就介绍“二苏大会”的选举工作中“妇女代表超过了党的号召”，“这次选举增加了代表的人数，妇女代表占代表总数的百分比，如兴国为百分之三十以上，乡苏主席有二十余个女子”。刘英、李坚真、王泉媛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

刘英是留苏党员，1933年6月才来到中央苏区。初到中央苏区，她不愿意留在办公室工作，而是积极申请到基层去锻炼。她曾回忆：“我生性爱说爱动，喜欢做群众工作，就向罗迈提出，愿来同志当年分配我学无线电是为了好找职业掩护，现在到了苏区，不需要掩护，我熟悉群众工作，还是让我干群众工作吧。”之后，刘英就在少共中央局担任巡视员。由于在工作中的积极表现，1933年底刘英被选为“二苏大会”代表。

长期从事革命工作的李坚真由于“一苏大会”期间负责为迷惑敌人而设的假会场布置工作，也错过了到现场参加“一苏大会”的机会。但是此后，李坚真努力工作，在妇女工作中取得了突出成绩。李坚真还积极团结当地妇女，鼓励她们动员亲人参加红军，并带头为红军战士洗衣服。正是由于这些突出表现，李坚真被选为“二苏大会”的代表。

“二苏大会”代表中，有着大批长期从事基层工作、成绩优异的苏区妇女。1913年出生于江西省吉安县的王泉媛长期在湘赣苏区开展妇女工作。为了做好工作，王泉媛经常到妇女家中讲解革命知识，宣传苏维埃婚姻政策，鼓励妇女反抗童养媳制度和包办婚姻，引导她们走出家门参与革命。她还带领当地妇女组成洗衣队，为红军战士洗衣服、缝衣服。由于这些出色表现，王泉媛被选为“二苏大会”代表。

苏维埃代表大会闭幕期间履职尽责

苏维埃代表大会闭幕期间，大量当选的女代表普遍在各级苏维埃政权和党委中担任了更重要的职位。她们积极履职尽责，全心全意为苏区群众服务。

参加完“二苏大会”后，周月林先被组织安排开展妇女、儿童工作，不久

之后，由于医疗卫生人才短缺，又被安排前往苏维埃国家医院担任院长。经过努力，她不仅在短时间内学会了接生、打针等基础技术，还在伤病战士中广泛开展了思想政治工作，鼓舞了士气。

“二苏大会”代表李坚真出任中共中央妇女部部长后，为了把妇女工作继续做好，她深入妇女中，号召大家为红军做鞋子、米袋子，为红军捐献财物，动员妇女交公粮、买公债和募捐等，另一方面又积极推进托儿所的建设。当时，许多青年上了前线，大后方的妇女们要劳作，还要带孩子，十分辛苦。为此，李坚真向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内务部报告，要求广泛落实《托儿所组织条例》，真正做到“改善家庭的生活，使托儿所来代替妇女担负婴儿的一部分教养的责任，使每个劳动妇女可以极可能地来参加生产及苏维埃各方面的工作”，让苏区妇女能够全身心投入劳动生产和支前活动中。

1934年参加了“二苏大会”的甘棠被组织派往中共中央妇女部任秘书。在工作中，甘棠除了积极协助李坚真组织妇女参加扩红运动外，还对基层妇女的民主选举给予了关注。甘棠经常参加基层女工农妇代表大会，鼓励妇女在会上发言，希望能够提高基层妇女的民主意识和参政热情。同时，在这一过程中，甘棠还经常将她们的意见收集起来，做成议案，以苏维埃代表的身份交给苏维埃代表大会讨论，以此推动苏区基层妇女参政议政。

开完“二苏大会”后，到少共中央局报到的王泉媛还自告奋勇到苏区最为艰苦的万田、下坝等地开展活动，立志做一名时刻与群众在一起的代表。由于长期与群众密切联系，取得了群众信任，王泉媛在第五次反“围剿”扩红运动最为艰难的时候仍然超额完成了任务。

从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广大妇女通过这一新型政体，走出家门，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并通过自己的努力，逐渐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及新中国政治舞台上不可或缺的力量。

（作者单位：江西省社会科学院）



苏维埃大学创立司法班

钟同福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叶坪村举行，来自中央、闽西、湘鄂赣、湘赣、湘鄂西、豫东北、琼崖等根据地，红军部队以及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全国总工会、全国海员工会的610名代表出席了大会。历时14天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产生了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制定和颁布了苏维埃国家的各种法律、法令，并在中央人民委员会内设立了中央司法人民委员部，专门负责国家司法工作。此后，苏区各级地方和军队的司法机构也纷纷建立，使苏维埃司法机构逐渐趋于完善。

为了适应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加强司法队伍建设被提到了中央司法人民委员部工作的议事日程之中。1932年，《中央司法人民委员部一年来工作报告》中提到：“司法人民委员部以后应当尽量造就司法工作人员，以充实各级裁判部。”1933年发布的《中央司法人民委员部五个月工作计划》中再次提到：“在实际工作中，有计划地训练司法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在机关内做工作的时候，给他们每天以一定的时间学习，每次去巡视工作回来，都给他们以几天的训练，在这样的训练中当来造就干部。”“开办军事裁判所训练班，以充实各级军事裁判所的工作人员。”

1931年12月间，临时最高法庭的筹备人员选择了瑞金县（当时为中



林英坚率十三团皖东抗敌

常红

林英坚，安徽省金寨县人。出生贫苦，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红军中，他先后任饲养员、战士、班长、营长、副团长、团长等职。他在鄂豫皖苏区参加了4次反“围剿”斗争，后随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

全面抗战爆发后，林英坚受组织委派回到大别山开展工作，1938年第四军第四支队组建后，任新四军第四支队七团参谋长、游击纵队大队长。不久，林英坚被编入新四军第二师五旅，他先后出任十五团、十三团团长。

此后，林英坚率十三团部队进入皖东，在与日、伪、顽军的战斗中取得了多次胜利。1941年初，日伪军纠集3000余人向皖东津浦路西根据地发起全面“扫荡”。此时，林英坚率十三团驻扎在安徽省定远县藕塘镇东南之皇甫山地区。盘踞在滁县县城、大柳镇和珠龙桥一带的400多名日伪军，兵分两路向皇甫山十三团驻地偷袭。林英坚得到情报后，决定将计就计，选择有利地形，打一场伏击战。2月12日凌晨，他率部冒着风雪赶到皇甫山西部地区，与战士们反穿棉衣，卧伏在冰天雪地里，等候敌人的到来。

天亮后，偷袭敌军走进伏击圈，林英坚立即命令战士们向敌人猛烈开火。敌人顿时被打得晕头转

向，慌成一团。林英坚一面指挥战斗，一面命令战士们“爱惜子弹，远处用枪打，近处用手榴弹炸，跟跟前用大刀砍”。敌军依仗武器优势，拼命突围，向曲阜方向逃窜，林英坚派队跟踪追击，于次日中午再截击敌人于曲阜，给敌人以重创，毙伤日伪军40余人。

11月下旬，国民党顽军5个团向路西抗日根据地进攻。林英坚率十三团守卫在黑狼庙一带，以1个营固守黑狼庙，迎击正面之敌；两个营在余家圩，巩固侧翼，防敌增援。26日上午，国民党桂系第一七一师五一团在定远大桥战斗中惨败后，以4个营的兵力，分别由西王集、鸦鸟集和周家岗向黑狼庙进犯，林英坚率领指挥部亲临前线指挥，连续打退顽军的3次进攻。顽军增调援军向侧翼疯狂反扑，双方展开激烈的阵地争夺战。林英坚带领从余家圩赶回的3个连的战士与顽军展开了白刃战，终于打退了进犯之敌，此次战斗，毙伤敌200余人，内有副团长1名，缴获机枪2挺、步枪100余支。不幸的是，在最后时刻，一颗冷弹击中林英坚的左前胸。

12月25日，新四军为林英坚举行了追悼大会。新四军副军长张云逸、二师师长罗炳辉亲临参加，张云逸致悼词，对林英坚的一生作了高度评价，号召全体指战员向林英坚学习。



琼崖独立总队竹崮桥头歼敌

吴小龙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共琼崖特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于1938年12月5日，将琼崖工农红军改编为广东省民众抗日自卫团第十四区独立队。1939年3月，独立队扩编为广东省琼崖抗日游击独立队总队，依靠海南岛各族人民力量，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1942年9月上旬，琼文公路附近群众向独立总队第二支队报告：近来日军每天有多辆卡车往来于文昌和海口。第二支队支队长符振中、副支队长覃威得此情报，立即派敢死枪排排长李贤祥带队侦察，很快摸清了日军车辆出动时间、数量，并勘察了整条琼文公路，找到了最佳伏击地点——竹崮桥。

确定伏击地点后，符振中、覃威向独立总队总队长冯白驹汇报并征得同意，决定由第一大队加强第二大队第四中队和敢死枪排，担任伏击任务，由覃威具体指挥。

9月17日晚，伏击部队从文昌竹崮驻地出发，于第二天凌晨到达竹崮桥，悄悄进入各自阵地。18日18时，从文昌方向传来汽车的发动机声。覃威立即传令准备战

斗。大家屏息静气，紧盯文昌方向。待日军车辆到达竹崮桥头，伏击部队将前两辆车放过去，将第3辆车打瘫在桥头，同时封锁竹崮桥，阻住了后面的敌人。

通过竹崮桥的两辆敌人卡车触发了游击队员埋设的地雷，车上敌人死伤过半。残敌跳下车辆，躲到公路旁的水沟里拼命顽抗。埋伏在公路两侧的游击队员利用交叉火力，压得敌人无法抬头，然后扔出一阵手榴弹，很快将残敌彻底消灭。

此时，被堵在桥南的敌人纷纷下车，一面用机枪、掷弹筒支援桥北，一面在猛烈火力掩护下企图涉水过溪。覃威命令阻击部队向涉水过溪的敌人猛烈射击，打得敌人无法渡河。趁天色渐渐暗下来，游击队战士迅速打扫了战场，消失在暮色下的树林中。

此战，独立总队歼敌1个中队，缴获机枪两挺、掷弹筒1具、长短枪30余支，击毁军车3辆，还缴获一批军用物资。战斗的胜利有力打击了日军嚣张气焰，鼓舞抗日军民士气，创造了琼崖抗战史上经典的伏击战例。很快，琼山县树德乡的群众编出一段快板：“独立队，真英勇，打鬼子，缴机枪，竹崮桥，敌丧胆！”

孙中山指挥空军讨伐桂系军阀

贾晓明

1917年7月，孙中山南下广州，护法运动开始。8月25日，一批国会议员南下广州召开“非常国会”，宣布成立护法军政府，以孙中山为护法军政府大元帅。10月，孙中山正式就职，随即组建中华民国军政府，并招募兵员，组建粤军。在孙中山的指挥下，粤军出兵潮汕平叛，并击败北洋政府进攻广东的“闽浙联军”，夺取了闽南26个县，建立了以漳州为中心的“闽南护法区”。

早在辛亥革命之前，孙中山就敏锐地觉察到了飞机的重要性，并把飞机与中国的革命实践联系起来。护国战争期间，孙中山曾指示在海外创办了多所航空学校，培养航空人才，并敦促海外革命团体迅速购置飞机，组织飞队，回国参加反袁斗争。护法运动开始后，不少航空人才追随孙中山来到广东。1918年初，孙中山在大元帅府下设立航空处，处长是美

国归侨机械专家李一得，副处长林福元，飞行员有张惠长、陈庆云、蔡司度等。航空处发现大沙头库房中有旧飞机两架，于是加以修理，经张惠长等试飞，认为飞机性能还好，就以大沙头为基地，训练飞行人员。1918年春，北洋政府任命盘踞海南岛的军阀龙济光为两广巡阅使，指使其进攻广东，与军政府所属部队展开激烈战斗。林福元、张惠长等驾驶飞机开赴广东南部战场，配合陆军作战。

桂、滇军阀虽然参加护法，实际上却企图“割据自雄”，因而极力限制、排挤和打击军政府的革命活动，不久便将军政府由大元帅元首制改为“政务总裁合议制”，架空孙中山。孙中山愤而辞去大元帅职务，离粤赴沪。

孙中山虽离开了广东，但仍十分关心航空建设。1919年2月，他命令杨仙逸、张惠长等赴汕头，帮助粤军建立航空队。4月19日，在得知杨、张二人已抵达漳州后，他又致函杨仙逸，希望他们发挥自己“对于飞机学问，研究素深”的优势，“力展所长，羽翼粤

军，树功前敌”。1919年6月，粤军在福建漳州成立航空队，队长为陈应权，实际总指挥则是杨仙逸，队员有张惠长、蔡司度、叶少毅、李光辉、余东华等人，拥有飞机6架。

孙中山离开广州后，桂系军阀为进一步控制广东，又剪除了滇军在广东的势力。1920年6月3日，孙中山等联名通电，揭露桂系假护法的行径，否认其把持的广州军政府。



PIANHOUSHIYI